

黄炎培研究文集₂

朱宗震 陈伟忠 主编



文匯出版社

黄炎培研究文集

朱宗震 陈伟忠 主编

(二)



文匯出版社

黄炎培研究文集(二)

主 编/朱宗震 陈伟忠

责任编辑/陈润华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 政 编 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青浦任屯印刷厂

版 次/200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50 千

印 张/11.75

印 数/1 - 1000

ISBN7 - 80531 - 924 - 3/G · 521

定 价/25.00 元

序

自 1996 年举行首届黄炎培研究学术讨论会以来,学术界对黄炎培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加入到黄炎培研究的行列里来,他们的研究富有朝气和活力。由于种种困难,我们暂时未能举办第二次黄炎培研究学术讨论会,有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学者们也就是进行了一次书面的交流,可以弥补未能进行直接交流的缺憾。

黄炎培是一位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和诗人,也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一生的活动,牵涉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黄炎培以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他的事业的基本阵地,但他的活动并未局限在职业教育的范围内。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一位对国家和民族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学者,对黄炎培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但对黄炎培在其他方面活动的研究则一直比较欠缺,这本论文集的多篇论文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围,成绩可喜。

20 世纪的中国,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他们活动在中国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领域,各自对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那么,我们又怎样去认识黄炎培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贡献?这应该是我们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课题。

20 世纪的中国,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

序

期,如何推动国家向现代社会过渡,是摆在开始接受新生活的人们面前的基本问题。但中国社会的改造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一方面是传统势力和传统习惯的顽固性和保守性,这种顽固性和保守性,不仅体现在既得利益者身上,而且反映在新进人物身上: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层面严重落后,并且矛盾尖锐,贫困,愚昧,人口众多,资源不足;而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列强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复兴和强大。黄炎培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造,他选择的道路,有三个基本层面,一是从民间事业着手,二是从教育事业着手,三是从职业教育着手。从这三个基本层面出发,衍化出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变革思想。由于黄炎培一代人,还在从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向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转变时期,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队伍尚未发育成熟,他本人的角色转换也是在过程中。因此,黄炎培是在民间探索着、实践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他是20世纪中国民间事业最重要的领袖。这是他同当时中国革命的和非革命的军政人物的重大区别,也是同胡适这样的思想界人物、荣氏家族等经济界人物的区别,也是同一些专业教育家和知识分子的区别。

历史学的难题是,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间事业,他们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如何?如何估价他们的历史命运?他们的经验对当代中国人究竟有什么启示和价值?是否存在民间事业的合理定位?近代中国的民间事业和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公共社会的功能有什么不同?

黄炎培研究事实上涉及到极为重大的理论和社会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教育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黄炎

培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与黄炎培研究的价值有着很大差距。本文集的出版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黄炎培及其从事的民间事业的研究。

序

朱宗震 2000年5月5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朱宗震(1)
从黄炎培与江苏省教育会看中国国家和社会关 系的历史演变(1905-1927)	萧小红(1)
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哲学意义	俞润生(31)
黄炎培教育思想的知识底色探析	余子峡(50)
黄炎培与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之比较	熊贤君 闻洁(86)
黄炎培教育思想体系平议	余子峡(105)
黄炎培开拓民间事业的历史定位	朱宗震(133)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再研究	闻黎明(149)
试论黄炎培从延安归来后的思想转变	陈伟忠 杨桂生(176)
黄炎培与时俱进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陈伟忠 杨正德(186)
黄炎培与职业教育实习社会化问题	卢正华(202)
黄炎培新场演说惹祸考	徐汇言(209)
对黄任老一首题画诗的考证	孙向忠 王乃云(217)
黄炎培教育理论与当今职业教育发展	徐汇言(222)
评黄炎培的素质教育思想	张梅君(226)
黄炎培与华侨教育*	别必亮(241)

黄炎培在教育启蒙与政治改造之间的两难选择	
.....	吴雄江(263)
黄炎培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白华山(293)
中华职教社徐公桥实验区的开发及其历史意义	
.....	余子峡 陈晴(310)
黄炎培与民盟的筹建及解散	 朱宗震(335)
后 记	 (365)

从黄炎培与江苏省教育会看 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1905-1927)

萧小红

自从 80 年代初恢复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来,国内外都出现了大量有关职教社及其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黄炎培的研究。近年来的许多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黄炎培先生在职业教育和政治等领域里的活动与贡献,^①但是很少触及黄炎培和江苏省教育会。后者是清末至民国期间的一个重要团体,而黄炎培与其共始终,从早期的活动分子、主要干部之一到后来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和这个团体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久远深长的。^②

江苏省教育会成立于 1905 年末,^③是当时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省级教育团体,很可能也是同类团体中结构最完整和活动最频繁的组织之一。它从成立到 1927 年 3 月被国民党当局解散为止,从事了大量推动新教育的活动并广泛联系本省各地区及外省的教育团体,在省内和全国都享有相当的威望并且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政治目标的组织,以“革新文化,伸张民权”(黄炎培语)为旗帜,曾先后参与了清末的保路运动、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以及民国时期的各种政治事件。本文试图通过考察黄炎培和江苏省教育会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探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黄炎培与早期的江苏教育会(1905-1911)

教育会的组织与性质

满清以异族入朝,历来严禁文人士子集会结社,除了范围有限的诗社、文学社以外,违禁和干预地方事务者要受到取消科举身份等严厉制裁。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加深,人心激奋,许多人都认为不能光依赖政府,应当以实际行动参加救国。于是江苏和上海附近的许多地方人士在家乡城镇所在地组织学会,办学校,出版报纸杂志,引进西学和探讨救国道路。1901年清政府颁行新政,进行教育改革,这些早期的活跃分子即成为地方新教育的积极推行者。^④

清代力行科举制,设有严密和成套的考试管理制度,但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奉命开办新学堂的地方官员通常都把创建和管理的职责委托给当地有一定名望或热心新学的绅士办理。这种局势很快促使地方人士进一步地组织起来,以增强改革的力量,共同克服新教育所面临的重重障碍。1905年初,张謇和当地人士率先在通州(南通)成立学务公所,上海、宝山、嘉定、苏州、常州、南京和扬州等地纷纷起而效之,这些组织实际上就是主持新教育的地方行政机构。当年九月,清廷下诏取消科举制度,在上海活动的江苏籍人士即在各地已成立的学务公所或学务总会的基础上,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次年改名为江苏教育总会),目的是团结省内各地的教育界人士,推动新式教育与新学制在各层面的确立,并为政治改革作准备。

省教育会刚发起时新教育还相当薄弱,它立即得到几乎全省各地热衷提倡新学的高层绅士和文人学子的积极响

应。它的早期会员包括众多的进士、举人及贡生。此后,他们中间的一部分逐渐为各地学务的实际负责人所取代。教育会最初拥有会员 175 人,至辛亥前已经发展到 600 多人,成员的地理分布比率始终是苏南地区(松江、太仓、苏州、常州)最高,其次苏中(南京、镇江、扬州、南通),最后苏北和淮北地区(淮安、海州、徐州),但各地区内仍有很大差别。省教育会以长江三角洲流域为重心和大本营,在组织结构上吸收了各地区的代表并保持与地方教育会的密切联系,因而很快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从总部驻地上海到各主要城镇的广泛网络。

参照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城厢工程总局以及国外同等学会的规章,教育会建立了会长、议事会和干事会的组织和选举制度。在运行机制上保持每年开代表大会一次,通常有一至二百名会员参加。大会报告会务,讨论形势方针和议案,决定将兴办的事业并选举会长和干事会成员。另有议事会组织,相当于立法机构,由各地推选的代表组成,但由于分散和交通不便等原因无法定期集合,实际上多在每年年会时召集。尽管如此,教育会的许多决议和活动都是经会员讨论或要求而制定的。

教育会的中枢机构是干事员会,它负责执行日常事务,每星期聚会一次,有七到十来人参加。内容包括答复地方或学校的要求和信件,交换信息,实施大会和议事会的决定并处理各类与教育有关的问题和调解纠纷等。教育会定期集会、选举和讨论的运行方式,以及公开文牍、财务的作法等等给团体生存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并有利于加强上海总部与各地的联系。

黄炎培是省教育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从 1906 年第二届

年会起至1911年,他一直担任干事员的职务,并于1909—1911年之间作为常任调查员赴全省各地了解教育与地方自治的进展状况,因此有江苏六十三县,“我足迹(遍)及四分之三”^⑤之语。这一时期先后担任会长的是德高望重的张謇(1905—1908)和唐文治(1909—1911),任过副会长的有恽祖祁、许鼎霖、王同愈和蒋炳章等多人,驻会(即秘书长)先为沈同芳,后为沈恩孚。这些人都是地方上的名流和绅士,不少人曾任过官职,其中张、唐、王、蒋与沈同芳皆为进士出身。王同愈任过学政,而唐文治在因母丧守制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即校长)之前,官至商部侍郎(即副部长)并一度署尚书。这些人从事新式教育和工商业活动并担任新式绅商团体的领袖,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威望,同时也是省级督抚大吏或地方官推行新政的依靠对象。

干事员会由年龄较轻和常住上海的活动分子组成,其成员的流动性很大。任干事员时间较长的,除了黄炎培以外,还有袁希涛、沈恩孚、吴馨、林康侯、龚杰、方还、雷奋、包天笑、夏清贻、杨天骥、陆规亮、曾朴等人。这些人都是上海早期新式学堂或报刊杂志的主持人,他们与正副会长和驻会共同组成了一个既有上层依靠,又颇具活动能量的领导班子。它广泛地参与省内的各种教育事务,积极联络地方和教育界中下层,同时跟省内和上海的绅商团体保持紧密联系。因此,教育会不仅是一个从事教育改革的有力机关,而且是新式绅士的权力基地。

江苏教育总会成立之后立即着手推动尚未设立教育会的地区创建同类组织,当后者受到地方官吏阻挠时,总会经常出面与省行政当局交涉,力争地方人士组织团体和参与教育事务的权利。1906年春夏之际,清政府在已成立的学

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教育行政机构,委派专管教育的提学使取代了以往主管考试的学政,在州县一级设劝学所,并且正式承认了省、县教育会的合法身份,将其确定为官方的辅助机构并隶属提学使管辖。省学务处(提学使司)吸收部分新式精英充当议绅、议长和省视学。黄炎培在谈到省学务处时指出:“由官厅延聘地方人士,赞画行政,这种参议制度,在当时其他行政方面,都还没有见过。”^⑥这些措施实际上已开始打破了原先不准文士参预地方事务的禁区。劝学所虽然置于县官控制之下,但由当地的绅士领袖人物主持,在很多地方与教育会的负责人常是同一班人马。他们的职权比过去的学董扩大了许多。

通过这些措施,清朝当局试图将地方精英纳入行政管理体系,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和控制这支力量,新颁布的教育会章程对它的活动范围与组织方式作了一系列严密的规定,包括各省、县只能有一个教育会,省和县教育会之间的关系限于协调而非属领,以及教育会干涉他事或内部不团结,官方有权解散等等。尽管如此,教育会的合法化很快推动了团体组织的发展,至1908年,江苏七十三个厅州县的绝大多数都成立了县一级的教育会,会员人数从四五十人到二百多人,教育领域里的团体力量得到很大的充实和加强。江苏教育总会成为官方正式的对话者及合作人,并在基层组织与省当局之间扮演中介和协调者的角色。

新教育一改过去以科举为轴心的制度,以发展普及教育和增强国力为目标,这种改变意味着教育的世俗化和教育成为国家职能的一部分。建立公共教育部门需要动员国家与地方的资源和人力,并要有专门机构的领导规划,但是由于清代国家的财政、行政体制未经改造,又无力扩大政府

机构,所以不能不起用新的社会力量,吸收地方精英参与教育行政管理,并力图保持对他们的严格控制。在兴教育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以及对民族危亡的忧虑方面,教育会的领导人和活动分子与改革派的官僚没有根本的分歧,但是他们坚信必须通过民间的参与和监督来抵制官僚机制内在的缺陷与弊病,为此致力于“团结一省教育界,时时纠正清季省官僚对学界猜疑的心理,和压迫或敷衍的过举”。^⑦其次,新教育是一项社会事业,改革派绅士尽管有一定的实力和社会基础,仍然面对着庞大沉重的传统势力的阻碍。在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总体的力量的同时,他们也通过跟官方的对话寻求政治上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江苏教育总会建立了与权力当局某种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

江苏教育总会的活动方式与取向

教育会的日常事务的涵盖面相当广泛,包括就地方教育机构、学校及个人来信要求提供咨询或建议以及就各处发生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根据教育发展的需要向行政当局提供改进学校管理、教学和经费等方面的意见和方案,还有规划教育设施,提倡新教育法,派遣专员赴地方调查,调解冲突纠纷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仅就黄炎培直接参与的一些活动为例。

清末实行新教育的一大问题是体制不一,缺乏合理的规划和严格的规章制度。虽然学部颁布了种种条例,但事属新出缺少经验,加上行政领导不力,用人徇私和官气、官场作风严重,造成大量的弊病和矛盾。江苏南菁高等学堂的情况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该校改自著名的江阴南菁书院,一向归省学政直接管辖并且有不少学产学田的收入。

1906年学政撤消之后,由于省当局委任的绅士领导无方,导致学校管理混乱腐败,引起学生以及社会的不满。省教育会接到各方面的反映之后,经过讨论,向省行政当局提出暂时关闭南菁学堂,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此举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为此,于1907-1908年两次派黄炎培赴江阴调查财务、校产、建筑等情况。黄发现南菁书院式的校舍不适用生徒众多的新式教育的讲学,并于第二次赴江阴时协助临时负责人筹备改建工程。^⑧总会在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充实了清理财务和重建学校的计划。1909年秋南菁经改建后成为省属文科高等学堂,以后因调整学校设置比例的需要,又改为南菁中学。在整个过程中,江苏教育总会起了关键的作用。^⑨

省教育会的另一大职能是为地方团体、学校及个人处理和调解各类冲突纠纷。这方面的问题种类繁多,从学潮教潮,财产财务和权限之争到隔阂误会,打击报复无所不有。由于行政部门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时,许多机构或个人纷纷上书教育总会要求帮助或主持正义,官方也经常借助后者之力解决矛盾。总会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方式首先是进行调查研究,在理清事实的基础上或说服争论双方,或向行政当局提出解决方案,或为受害人伸张正义。1906年末,嘉定县有人致信教育总会,指责当地高等小学腐败等弊端,同时另一小学因学董与校长龃龉造成停课并影响到其他小学校。黄炎培受命前往查实后,阐明事非,指出前者设施与课程安排有缺陷,但谈不上腐败;后者之纠葛则因校舍与家宅混合所致。教育总会即据调查报告劝告各方应以讨论方式解决分歧而不宜随意扩大矛盾。^⑩1909年,江宁高等商业学堂屡起风潮,教职员互相攻击,黄炎培与总会同人经

从黄炎培与江苏省教育会看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

过详细调查,发现该校严重地管理不善,教育总会因此向江宁提学使提出严加整顿以端正校风的意见。^①

由于新旧制度的交替和教育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及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既得利益,清末有关办学人员的诉讼案大大增加。教育总会的干预对维护公正舆论和保护热心新教育的活动分子是很重要的。1907年,杨斯盛与水木公所(即建筑业)同人因公所董事阻碍办实业学校等事,上书要求上海县令同意撤换另举。新任的县令不了解情况,误以为公所帮派闹事,欲追究杨斯盛的责任。经黄炎培报告后,总会遂致书上海县令为杨辩解,使问题得以解决。^②

1908年初,黄炎培本人被控一案涉及政治,性质更加严重。黄此时兼任川沙厅视学,因为在履行职务时得罪了人,被后者向省当局控告在浦东中学“演说革命排满”,此外又将1903年南汇新场演说旧案^③牵入以打动官方。江苏提学使毛庆蕃接案后进行了秘密调查,对黄的言行多有不满之处。杨斯盛和上海、川沙两地绅士竭力为他辩解,教育总会则上书两江总督端方,将事件提到原则高度,坚决反对以语言文字治罪。端方与毛庆蕃显然不想过分得罪教育会和地方绅商,最后由毛撤除黄炎培的厅视学职,保留浦东中学监督,并告戒他不得再参预“浦东七日报”的事务。除此之外,毛庆蕃还要求上级令川沙厅、上海县的地方官就近查看黄的改过情况。^④

清末的权力当局尽管相当衰弱,但仍保持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和镇压能力,然而清政府要实行新政的现代化方案,离不开改革派新式精英的协助。出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时有争执,但同时也互有妥协和让步。

以教育总会为代表的江苏新式精英不仅仅是新教育的

积极推行者,而且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在他们看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由于长江下游经济中心的地理位置和张謇等人身体力行的提倡,江苏教育总会一向特别关注教育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希望通过发展实用教育来传播科学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和改善国计民生。总会领导人很早就开始推动学界与商界的沟通与合作,并且大力提倡技术教育和“实利主义”,即注重实用科学知识和讲求有效教学方法的取向。^⑤他们或者积极创办技术、实业学校,如张謇与浙商合作在吴淞办水产学校,在南通办工艺学堂;以教育总会骨干为主的江苏铁路公司在苏州办铁路学堂培养测绘和工程建筑人才;或者在各自主持的学校里加强实验设备和科技课程,如唐文治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交通大学前身),贾丰臻在上海龙门师范学校等。总会在改变读书人歧视体力劳动的传统和加强教育与生产的联系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1909—1910年之间推动各地积极参加筹备和举办南洋劝业会;在1911年夏季学部召集的中央教育会议上,使手工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的议案得以通过。为了改造传统和陈旧的蚕桑技术,1910年江苏省谘议局通过了教育总会有关开办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的提案,这个学校后来在专家郑辟疆和费达生的领导下成为中国最出色的蚕桑研究和推广中心。

省教育会还经常向地方团体和人士宣传推广“实学”与开拓“生计”的重要性,作为总会的常任调查员,黄炎培在各地巡视之际,也经常提醒地方人士应注重实业补习科和有关当地水利、地理等课程的教授。江苏是水网地区,常受水患的危害,苏北和两淮地区的水利问题尤为严重,以至辛亥后黄炎培接管省教育行政后即宣称“江苏而无政治则